

更生人就業與家庭適應之社會工作

曾 華 源

一、前言

當一個人犯過錯被處罰以後，卻找不到工作，這個社會值得誇耀嗎？

根據更生保護法第 11 條規範，得依情況實施更生保護，可以分別採用直接保護、間接保護與暫時保護等三種方式。其中，直接保護包括：以教導、感化或技藝訓練之方式行之，對衰病老弱者，送救濟或醫療機構安置或治療。間接保護以輔導就業、就學或其他方式行之。暫時保護以資送回籍或其他處所，或予以小額貸款或其他適當方式行之。因此，推介更生人至更生事業就業屬於直接保護，開辦更生事業則屬於暫時保護之範疇。就其所陳述之更生保護三種方式均「得依情況……行之」。顯然有些消極。因此，曾學經（2004）的研究顯示，

更生保護會總人數與法務部同年度出獄人數兩相比較後，發現更生保護會僅對約九分之一的更生人提供服務。除此之外，更生人家庭成員是否需要協助處理社會適應問題？

其實受刑人受到刑事懲罰之後，受刑人及其家庭在社會適應上，還會繼續受到各種不同程度之挑戰。由於國內外研究（Rex, 1996）均顯示更生人出獄後，在家庭和就業適應良好與否，與再犯罪之可能性有高度相關。因此，對於更生人和家庭在社會適應上的輔導工作就顯得有相當大的必要性。本文對「輔導」一詞之意含採取包括心理諮商服務和社會工作服務，論文重點擬從更生保護之理論分析，探究保護輔導工作之基本原則，並整理分析國內現有之輔導措施，以提出增進輔導工作效果之一些建議。

二、更生人社會工作相關理論與實務工作原則

(一)更生人社會工作專業服務之相關理論

1.個人行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個人與社會是彼此相連不可分割的整體。Robert 與 Agnew (1992；引自蔡德輝、楊士隆，2006) 提出，犯罪行為是相互依附影響的現象，社會環境與身體特徵皆能影響犯罪行為的發生，而犯罪行為本身也會影響個人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

從生態學 (Ecology) 理論觀點認為生物體與其棲息環境 (habitat) 間是一「交流」(transaction) 與「調適」(adaptation) 的過程；特別是生物如何運用環境中的資源、如何因應 (coping) 必要的變動而修正生活機制以維繫生存的需要，以及生物如何與環境相互調適，以提升個人適應環境的多元性和增進個人生存的可能性 (Germain & Gitterman, 1980；引自鄭麗珍，2002)。因此，個人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化，與棲息的环境保持適切的配合 (goodness of fit)，以便在環境中取得生存所需的資源。就生態系統的觀點來說，人具有主動性與創意性，但外在棲息環境的利基

(niche) 使人必須要能夠發揮高度的適應能力，來配適 (fit) 棲息環境的生存條件。是故，人有復原力 (resilience) 或某些優勢 (strength) 能面對環境的挑戰，但同時也可能存在有某些挑戰生存的環境劣勢 (weakness) 必須克服。當個人與環境處於適配的狀態下，顯示環境具滋養性，人會呈現出好的因應能力 (coping capacity)；反之，若處在不適配的環境下，缺乏資源，而個人又不易克服此一逆境時，將阻礙了個人的適應與發展，甚至死亡。所以，社會工作者一方面要肯定更生人具有因應惡劣環境的韌性，另外一方面也應該協助改善或創造一個滋養、有利的生存環境。

系統的觀點強調各次系統之間是動態的演化與變遷，彼此是消長與調適的。系統有可能透過分化，使系統的界限範圍擴大，但系統仍保持一個獨特的整體而不至於過度分歧，使系統可以維持一個整體。系統之運作目標在維持本身範疇的完整。系統本身彼此是相互影響而形成一個回饋圈循環不已，如果系統是開放的有可能輸入適當資源而可以持續生存跟調適，如果輸入之資源不敷本身所輸出者，將導致系

統的死亡或毀滅。因此，系統本身在互惠之中可以維持一種協同作用（synergy），即從外在環境獲得資源或彼此互動中創造能源，則可以維持穩定或平衡運作（施教裕，2002）。就此而論，更生人家庭輔導應透過外在社會福利系統，提供支持性資源，以協助家庭能夠妥適運作。如果缺乏外在資源，則是系統內部的自行循環，將有可能導致系統耗盡資源而滅亡。

標籤理論（Labelling Theory）強調社會群體之反應對個人心理、行為之影響（蔡德輝、楊士隆，2003）。若情境將個人定義為偏差，則個人也將內化為自我概念，進而影響其行為表現。顯見標籤理論是一種刻板印象對人所形成的偏見影響，甚至導致有歧視行為的發生。對個人來說，由於被建構的負面自我概念，會影響個人表現出被預期的行為。因此，標籤理論來說，應為更生人建構一個正向的社會環境，才有助於個人脫離再犯的可能。

2.形塑個人行為之可能策略

一般犯罪理論（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卻認為，偏差行為的發生是一種理性認知的行為反應；強調個人會理性計算犯罪行為的功

利面與道德面之代價，再決定犯罪與否（Grasmick & Bursik, 1990）。因此，當人認知犯罪會付出社會性成本時，將會自我控制。一般犯罪理論強調，控制犯罪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讓犯罪者獲得法律與社會的懲罰。其中，法律的懲罰是罰款與監禁，社會的懲罰則是羞恥與尷尬。Hirschi（2002；引自鄭峰銘，2006）提出有四種社會鍵（social bond）；包括：附著、承諾、參與、信仰，以便控制個人和社會之連接性。附著此一社會鍵是屬於情感因素，即在乎社會的想法、怕失去別人的喜愛、在乎別人的看法，其中附著是指於父母、學校與朋友；顯示社會鍵的「附著力」是遏止犯罪最主要之力量。因此，當受刑人被法律懲罰而被監禁或被罰款時，若社會的懲罰沒有同時在監獄中進行，以使受刑人產生內在控制力？那麼返回社會上再度犯罪時，將持續被標籤。

再者，理性行動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認為態度、意向及行為三者間依存關係（Ajzen & Fishbein, 1985）。認為行為意向會受到「態度」及「主觀性規範」所影響。個人行為最直接影響的決定因素就是行為意向。當個人對行為

的態度愈正向，則行為意向愈高；反之，當個人對行為的態度愈負向，則行為意向愈低。主觀性規範涉及社會習俗、他人意見或壓力等相關因素，相對的也就影響了行為意向。此外，直接經驗與態度同時存在時，也會直接影響態度與行為之間的張力。個人的態度透過對事物或狀況所反應的行為，將會形成個人經驗。所以個人的行動之前會先就個人經驗和對環境中他人意見事先預估其可能之後果，並且這些後果是個人認為值得的，才會採取行動。其立論基礎與一般犯罪理論是近似的。因此，對個人來說，離開監獄以後，個人會對就業或返家計算是否會有預期之效果，來決定是否值得採取行動。是故，如果將個人的「非自願行為」視為「不值得行動」的理性決策結果。因此，改變個人對行為（就業、家庭關係維繫）的認知為具有高度價值，將是重要策略，以提高個人行為動機、或行為意向。

Gottfredson 與 Hirschi (1990) 檢視犯罪行為的最大特徵在於低控制者對行為產生的立即快樂較為敏感，且從事多樣化的犯罪偏差行為。由於低自我控制 (self-control) 的人較少注意行為的長期代價，因此增加犯罪者的刑罰對低自我控制者是沒有效果的。再者，Zillmann (1993) 指出，

個人在激發狀態下將影響認知評估能力，在個人認知缺陷下將降低個人正確評估行為結果的能力，或合理行為計畫的能力。Bandura (1997) 強調個人的自我與環境互動如果能得到正面的評價，將使個人朝向更高次序的制約和規則的學習，使個人朝向自我節制 (self-regulation)。由此看來，個人自我控制能力的養成，與認知能力的提升息息相關。對於抽菸、酗酒、使用非法藥物者，應強調對他們提升自我控制能力。在這一部分，體驗學習 (experience learning) 將可以發揮高度效果。

(二)更生人社會工作之實務工作原則

總括說來，對於更生人的輔導工作不能忽視環境改善與個人增權，從上述理論來看，對更生人輔導應有整體輔導規劃和措施，應發展的工作原則與工作方向：

1. 人會理性計算行為可能後果和價值，而且人也與生俱來有長處和復原力。如果有利益將使人自願參與；如果能夠積極協助他們成熟和獲取適合社會發展需求之職業技能，將可以發揮個人長處和增加韌性。

2. 為有效預防更生人再犯，單單是監禁是不能增進個人自我控制，所以社會的懲罰需同時在監獄中進行。

首先應該透過運用態度改變之理論和認知行為治療，採取個案工作和團體工作之方法，增進更生人的自我控制與自我效能為重要途徑，監禁受刑期間應積極提供發展內在自我控制力的輔導。再者，在監獄中，不應以有無動機作為服務對象的選擇標準，而是應該針對所有受刑人。

3.應建構滋養性環境，以利更生人的環境適應。因此，除應檢驗現有宣導工作的方法與成效，以降低環境中負面標籤的力量之外，對於建構獲得雇主與家庭信任與接納之制度亦很重要，所以還應該建構增進更生人就業機會的制度。

4.家庭是一個彼此相互影響的社會系統。家庭是個人重要的依附來源，也是個人社會支持的來源。因此，協助家庭增進社會適應能力，將有助於家庭協助個人克服社會適應障礙。

三、對台灣更生人保護工作之檢視

受刑人出獄要進入更生並非是容易的過程。Bernard（1995；引自嚴健彰，2003）提出個體的保護因子能否產生復原作用，需視個體生活環境中是否有下列三種因子存在：(1)關懷的環境：至少有一位成人瞭解關心其未來的幸福；(2)積極的期望：清楚明確

度高的期望，有目的的支持；(3)參與的機會：有機會對社會作有意義的投入。顯示除去個人有明確就業意願和抱負之外，家庭成員之間相互支持，成人觀護或更生保護系統也需要有效運作，而社會也應該提供機會。法務部犯罪問題研究中心（1992）調查顯示更生人之更生意願高，且有超過半數決定出監後要工作，許多更生人會因感到受差別待遇而困擾（法務部犯罪問題研究中心，1992）。此外，法務部犯罪問題研究中心（1999）研究假釋出獄者，面臨的社會適應問題以經濟困難與找不到工作為多，最大的期望除了要有安定工作外，是希望能跟家人團聚。不過，有五分之二者認為就業機會受到影響，顯示出獄者就業障礙不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徐全裕（1998）研究工作不穩定是再次犯罪的高危險群。張智雄、柯雨瑞（2005）指出，家庭依附關係與戒毒者戒治處遇效果有相關性存在。由上述研究均顯示，更生人的更生過程中有許多的障礙和需求存在。除了外在環境的社會性障礙之外，個人的自我覺知、家庭互動關係等因素，其實是有相互密切關係存在。

(一)更生人家庭適應風險與保護服務之障礙

個人犯罪之後，除犯罪者入監服

刑之外，其家庭和子女生活照顧會受到很大的衝擊。除了家人和子女將是一種嚴重的心理創傷之外，另外未入監獄的成人要負起照顧子女的責任，還需要在鄰里街坊、學校和工作場所等社區生活中承擔污名和排斥（王瑞婉，2003）。因此，家庭如何從傷痛中恢復是一個重要議題。

台南縣一名姓女子結婚二十多年，因先生和未滿 14 歲的少女發生婚外情，對方父母要求賠償一百多萬元和解，但她家拿不出錢，該女丈夫遭判刑 1 年 6 個月，約兩個月前入監。該女的大女兒已經結婚生子，還有一女一子分別就讀國中、國小，她帶著一雙年幼子女，與公婆、小叔夫妻住鐵皮屋。前天該女到監獄和先生面會，還鼓勵先生要熬過來，不料昨日上午她持雙刀割腕入刺胸自殺死亡。她的小姑說她因先生入獄，覺得不名譽，心情低落。

聯合報 A10 版（2007.5.31）

再者，家庭為一個系統，系統是否會有良好調整和平衡，常需要各種不同協助，才会有比較好的適應。除了更生人入監離家之後，家庭要調適之外，更生人出獄後，也需要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系統重新有好的調適才能真正返家。因此，更生人出獄後要

回到家的路是長或短，是不能任由家庭系統自行調適，應多協助更生人家庭強化依附和情感之社會鍵。

McCubbin & McCubbin（1988；引自鄭峰銘，2006）研究二次大戰後家庭，發現家庭成員體諒和支持、配偶的照顧、家庭的凝聚性，以及社區的支持等優勢力量之交互作用，是幫助戰後家庭復原的重要因素。McCubbin, McCubbin, Thompson 與 Allen（1997）指出，使受創家庭產生復原的力量有二種，其一為幫助家庭面對生活變動壓力調適（adjustment）的家庭保護因子（family protective factors）如：家庭凝聚力、因應技巧、社會技巧、家庭堅韌性、增加家人共處時間、靈性信仰等，此類復原力因子之功能在於協助家庭面對生命週期發展的風險調適；另一則為幫助家庭面對危機逆境之適應（adaptation）的家庭復元因子（family recovery factors），如：家庭的統整、個人在家庭中的自尊與支持的建立、家庭的擁護支持、家庭意義的建構、家庭模式的影響等，此類復原力因子之功能在協助家庭處於危機情境中的適應（引自鄭峰銘，2006）。這些因子可透過諮商或支持性輔導措施產生上述二種因子；如夫妻懇談、家庭親子活動、家庭治療方

法、受刑人家屬支持性團體等。

由於系統雖然會自動平衡，但平衡過程不一定成員都能獲得滿足。以受刑人本身來說，回歸家庭的不利因素，包括：單親、工作不穩定、低學歷、再犯率高、低收入或不穩定、家庭暴力、以及子女的問題（學業、行為、情緒）、不健康的環境（暴力、物質濫用、犯罪紀錄）等風險因素。因此，針對有子女的受刑人，應該改善受刑人之教育與就職機會、鼓勵獨立生活，亟待矯正機構在服刑期間加強教化，提供職業訓練，協助生涯規劃（鄭峰銘，2006）。因此，當受刑人入獄服刑時，家庭系統正處於變動階段，所以必須評估受刑人家庭是否需要提供危機介入（Kissman & Allen, 1993）、評估家庭相關福利需求，以幫助更生人家庭增權，以協助家庭系統運作良好。

其實只有單獨一人負起照顧家庭，是否可以視之為單親家庭而享有社會福利協助？單親家庭除經濟上的負擔沈重之外，照顧上的壓力和教養上的無力，將使得家庭維繫功能面對高度風險（曾華源、郭靜晃，2000）。社會福利制度是否應該積極介入，提供相關需求之服務方案協助受刑人家庭和子女社會適應？目前以內政部「推動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

遇實施計畫」辦法來說，「負擔家計者死亡、出走、重病、入獄服刑等」被列為高風險家庭之評估項目之一。此一評估標準乃是為發現高風險家庭、通知社政單位提供關懷性服務，但家庭關懷輔導目標是藉以預防兒童少年受虐及家庭暴力事件發生，而非真正針對受刑人家庭提供所需要的支持與輔導。至於大溫暖計畫是針對「個人及家庭發生重大變故而陷入困境急需救助者」及「處於貧窮邊緣而急需救助的經濟弱勢家戶」，期待藉由提供其急難救助、就業輔導、職業技能訓練、創業理財、短期小額貸款、醫療照顧、照顧服務、就學輔導、人身保護、法律扶助等多面向福利措施，協助經濟弱勢家庭逐漸自立自強、脫離貧困。如果是屬於「弱勢家庭脫困急難救助」，資格必須是「經營事業不善、失業未能領取給付、領取失業給付期間已過仍未紓困、因經濟性因素有自殺之虞通報個案、已申請福利項目或保險給付，尚未核准期間、因遭家庭暴力、性侵害、存款帳戶經凍結、其他特殊情事、處於貧窮邊緣之經濟弱勢家戶」。

（二）更生人就業輔導工作之障礙

有許多研究指出，更生人就業是防止犯罪的有效方法之一（廖滿足，

2005)。但是更生人就業障礙相當多。由於接受就業輔導的更生人大多從事農漁牧或低技術性的工作；諸如業務員、清潔工、水電工、打字員、機台作業員、看護工、餐廳服務生、學徒、司機、土木水泥工、搬運工等。更生人的就業除了自己找尋工作之外，目前主要有二個單位辦理就業輔導方面之工作。更生保護會有辦理就業訓練、轉介就業服務中心安置就業、協助開辦更生事業，與推介至協力廠商就業之外，更生保護會還建構就業服務網絡、建立輔導就業資料檔案、推動開辦事業創造以及提供就業資訊，對於更生人就業後，提供追蹤輔導六個月，並且得結合就業輔導機構之個案管理機制，提供更生人職場諮詢及生活輔導。另外是勞委會公布就業服務法修正條例，對於僱用3個月以上更生人雇主，將獲得僱用獎助津貼。勞委會所屬的職業訓練局職業訓練中心和就業服務中心可以免費參加就業促進研習活動，推介一般性或臨時性就業服務或提供個別化、專業化就業諮詢和職業訓練；至於參加公私立機構職業訓練，而且經濟有困難的更生人，得以減免訓練費用，並酌予補助伙食費與零用金。其他諸如雇主座談、建立職業觀念與職場接軌之就業準備宣導活動和就業適應能力、

就業促進活動等。符合非自願性離職身分及特定對象身分者，適用就業促進相關津貼（包括求職交通補助金、臨時工作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創業貸款利息補貼）。（註1）

以中彰投就業服務中心年度計畫（2007）為例，預定在轄內各間所、地檢署、更生保護會各地分會辦理求職300人，就業服務100人；包括出獄前就業準備成長團體活動10梯次，出獄前就業促進研習活動7場次（每場次60人），獄內就業服務講習活動60場次（每場次50人），獄外就業促進研習活動3場次（每場次30人），雇主觀摩監所3場次（每場次10家）。整體說來，職業訓練局針對有就業意願和有工作能力之更生受保護人訂定「更生受保護人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轉介輔導機制」，各地就業服務中心只有一部分力量針對更生人提供服務，大多數是併入非自願失業的就業服務項目辦理。

廖滿足（2005）檢視國內影響更生人就業困難原因，有更生人本身、雇主與社會因素等三方面。以下將分為個人因素和社會因素二方面說明。

1.個人障礙因素

更生人就業上個人因素障礙不少。除了嚴健彰（2003）和廖滿足（2005）所提之原因外，另外訪問中

彰投某位工作 4 年的督導和台中生命線資深工作者，更生人就業障礙的個人因素很多，更生人的教育程度較低，缺乏教育體制內的職業教育，有近八成者入獄前，社經地位偏低，且從事體力勞工和農林漁牧業，甚至是無業和無固定工作者。加以當前知識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經濟景氣不振，就業技能日新月異，致使更生人在求職與創業過程更加困難。除去上述個人工作條件（學歷、年齡與刑事罪刑別）不足，以及接受職業訓練種類和職業訓練能力不符合社會發展需求之外，薪資未達更生人預期水準或更生人對就業職場認知不足，以及自我期許過高，又缺乏工作適應力（作息與獄所不同和缺乏自制力）。加以人際關係技巧（獲得雇主信任、同事相處和諧）不好，缺乏運用資源的能力，以及工作態度不良（工作價值、工作責任感、細心、自尊心低落、挫折忍受）和不良個人習慣（吸毒和戒毒、戒酒問題未被處理）等因素，都足以造成個人就業障礙。如果家庭支持再不足，經濟能力不好，更容易覺得社會缺乏溫暖。就此而論，更生人出獄時亟需經濟資源、目前需向更生保護會申請，但資訊不足和申請程序不便，將是一個阻礙。如果在監獄接受職業能力訓練不足，社交溝通技巧

不夠，以及自我效能不夠時，將是個人阻礙因素。如果加上雇主的偏見和家庭支持不夠，常會使更生人自絕於可能的就業機會。

2.環境障礙因素

除了就業個人因素障礙之外，環境障礙因素也不少。周素嫻（2005）研究指出，依據更生保護會統計，更生人不得從事的行業分別規範在 82 個法條中。雖採負面表列方式，但執行上，由雇主詢問受雇者或要求向警察機關申請警察記錄證明。其中，企業考量更生人再次犯罪所做出的傷害會影響公司的正常運作，為避免風險大多不願意僱用。

雖然，職業訓練局各地的就業服務中心提供就業機會，更生保護會開辦事業創造，以及透過媒體網路和志工系統來獲取就業資訊和開拓協力雇主。但是，更生人就業最大困難就是是否要告知雇主前科記錄。其實不論犯罪者有沒有接受職業訓練和就業前的準備，或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良好與否，雇主的態度大多數是不願意忽視犯罪者的罪刑，或忽略犯罪者的標籤（廖滿足，2005）。受歧視和雇主刻板印象所影響，由於缺乏對更生人的基本保障法規，許多雇主就不會給更生人有公平就就業機會。加以是否可以查閱的前科資料，並未明文規定，

雇主大多對前科者有負面歧視態度。然而，前科記錄被揭露的範圍為何？以判決記錄為主嗎？或只有宣告徒刑的犯罪？前科是否可以塗銷？等待塗銷的時間要多長？哪一些犯罪終生不得塗銷？均是影響更生人就業權益，及更生成功與否的重要影響因素。周素嫻（2005）指出，協助更生人就業最具爭議性的問題包括；第一，更生人是否需要告知雇主其過去的前科記錄，以及這個記錄如何影響其就業機會或就業權利的問題；第二，即使雇主願意僱用有前科記錄的更生人，雇主如何面對可能因為僱用疏失，造成自己事業或顧客的損失；第三，國家應如何透過查驗受雇員工的前科記錄來保障若小團體的安全，但同時兼顧人民的基本人權。其依據之假設是有前科犯罪者應該比較容易再犯罪。其實周素嫻（2005）檢視相關研究發現前科犯罪必須配合接受處遇經驗、更生人經濟狀況、社會支持、休閒活動與使用毒品等因素，才具有預測準確度。其中，法務部統計顯示，竊盜犯、菸毒販、性侵害犯再犯率高，所以雇主僅用員工前科記錄來預測更生人在工作上可能會造成危害，其效度不如想像中高。尤其是國外研究顯示，造成員工人身最大傷害的來源，常常是陌生人、顧客、家人，而非同

事（Duhart, 2001; Tjaden & Thoens, 2001；引自周素嫻，2005）。

四、對更生保護制度與執行之建議

（一）向上延伸更生人保護作業流程

開始辦理更生保護處遇服務的時機，應該是在出獄之前或入監服刑後針對每個人做有計畫性的輔導？其實更生保護處遇服務流程有需要延伸至入監服刑階段（請見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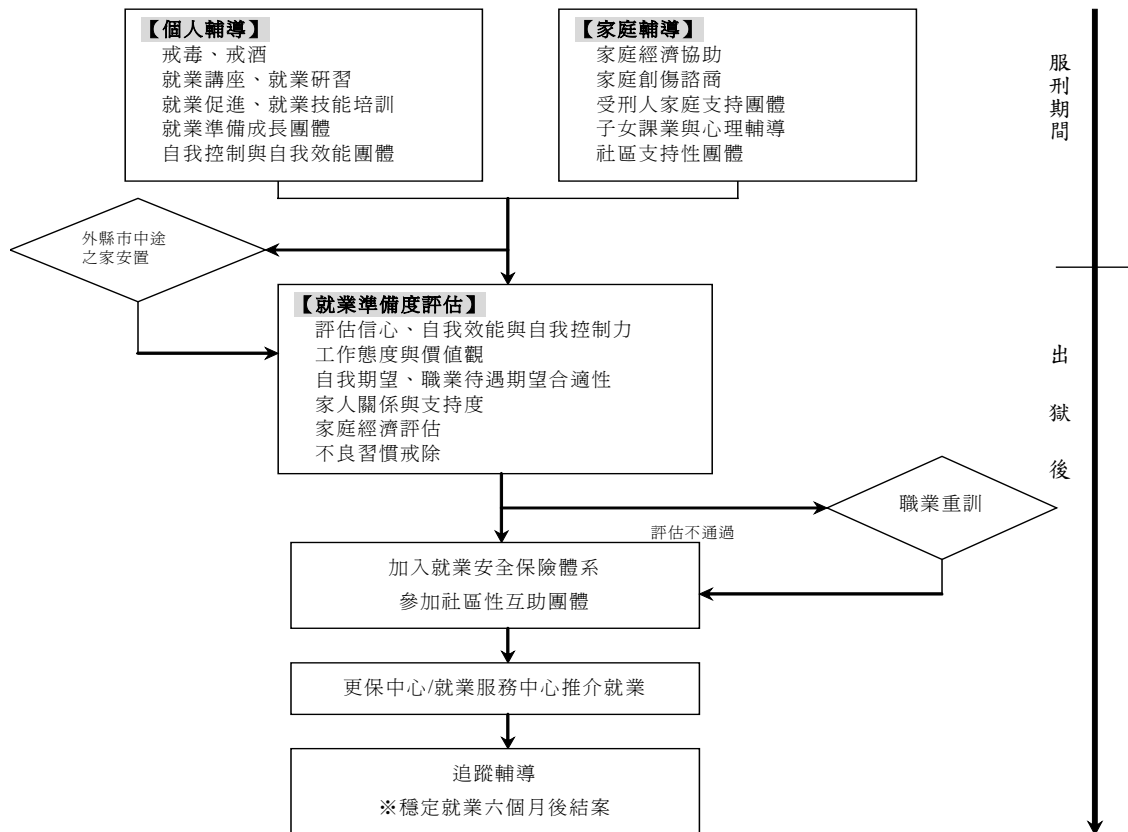
1. 第一階段：在監服刑

依據更生保護法之規定，目前因為在監服刑的人數眾多，而需要輔導、教悔和各種教育訓練的受刑人常常超出監所人力配置。故採自由報名或由監所輔導員或由教誨師推薦之方式，才能參與提供職業訓練和就業輔導服務方案。徐全裕（1998）研究發現更生人對監所的職業訓練滿意度不高。除顯示需要加強深度之外，其實根據上述列舉中區職業訓練中心和各地更生保護分會所辦理之各種職業訓練和就業輔導之服務方案，也有數量不足和品質需要加強的情形。

職業訓練方法大多採取認知性的講課，對個人信心、內在價值、自我效能、就業態度的增進是幫助不大的。在監所內對受刑人提供之職業訓練，不是只有工作或上課，應該運用個案工作和團體工作的方法，先積極

提升更生人的自我效能、工作態度和社交技巧，以強化自制力、意志力、

規劃力、控制力，而非只有職業技術就能就業。



圖一 更生保護就業與家庭輔導流程圖

2.第二階段：出獄前的社會適應準備

目前更生保護協會的人力大多屬於兼任或志願服務者，使組織功能受限不少（嚴建彰，2003；廖滿足，2005）。法務部所制定之「更

生人就業服務與值夜訓練轉介輔導機制」中，服務對象以「有就業意願及有工作能力者之更生人」為主，並且只是要求服務提供者建立個案、雇主名冊，缺乏積極性的業績指標設定。在辦理以出獄前講

座，認知層次的資訊提供為主，難以改變工作態度或價值。各地法院、就業服務中心作法與積極、落實程度不一，並且利用現有的就業服務制度轉介個案，個案管理者能否掌控實際需要？此外，更生保護服務輸送和轉介需要整合，許多更生人之個案資料並未適當的資訊化處理，常造成轉介和統整性瞭解更生人的現況上出現落差，以致於個案管理功能不易發揮落實。故必須真正落實就業輔導制度。

(二)增強就業輔導制度之功能

1.訂出安置就業之實質績效標準

再其次，現有的更生人就業輔導制度大多只是辦理職業技能訓練，與就業相關的講座和雇主座談，未能針對各就業服務中心訂出安置就業之實質績效標準。有些更生人願意工作但需遠離過去入監前的環境，但全省暫時安置場所（中途之家）甚少。

2.擴大獎勵聘用更生人就業面向

應採取獎勵措施，鼓勵就業輔導員主動開拓就業機會和媒合就業，為能增加雇主聘用更生人之意願，除了現有對雇主僱用更生人有獎助之外，還可以考量增加獎勵就業機會提供者可以免（減）稅。

3.開辦更生人就業安全的保險制度

辦理更生保護會應考量建構類似國外更生人就業安全的保險制度（周素嫻，2005）；然而，此一制度不是人人都可以參加。必須通過類似台中生命線所辦理之個人自我探索、自我認識、情緒管理、工作倫理、工作類屬的價值觀澄清、求職技巧、實務演練等自我效能提升訓練（台中生命線，2006），戒除不良習慣和職業技能訓練之考核，並且宣誓過後，才能加入成為會員，更生人也因此在社區中有社會性團體做為支持後盾。

4.加強辦理更生人家庭互助功能

對更生人家庭的協助闕如：應提供增進社會適應力的多元協助，除建構受刑人入獄後單親家庭的救助制度之外，還應籌組實際支持系統——地區性自助團體（self-help group），在親人入獄後立即前往訪視，瞭解可能之需求，協助建構家庭凝聚力、家庭彼此信任和相互支持，以及家庭因應危機之力量，使受刑人在入獄後，其親人能有信心和自尊心面對社區的社會排拒壓力。

(三)建構更生人友善的社會環境

現有的更生保護工作偏向以更生人個人為焦點之處置，並且處置

積極性不足。目前僅是一般性宣導工作，未能對去除烙印和偏見做動全面性規劃，在去除負面社會刻板印象上，有待採取積極性的倡導之措施或推動社會運動。

五、結語

對於更生人在社會適應的需求是需要特別重視。近幾年來，對更生人輔導工作做的比過去多。在政策重視更生人的就業輔導立意，但規劃的措施所涵蓋之面向不足，未納入對家庭的協助。加以投入輔導資源不夠，雖有詳細辦法和規定，卻在人力和物力資源不足下，只好多結

合社會資源辦理，變成服務輸送流程複雜，不易追蹤更生人就業流向。導致對更生人輔導工作在執行上常出現瓶頸，而不容易達到預期績效。其實更生人的就業與家庭適應需求，乃是一個涉及個人性與長期結構性因素下交互影響的複雜問題。目前所採取的作法較為被動，以及面向不足，是不容易掌握效果的。未來需要有更開創性、積極性和整體性規劃才有可能呈現具體輔導效果。

（本文作者曾華源現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

註釋

註 1：由職業訓練局所屬 5 區就業服務中心辦理「94 年度扶持您再出發—協助更生受保護人就業活動」，辦理(1)建立職業觀念與職場接軌之就業準備宣導活動，共辦理 74 場，4572 人；(2)就業適應能力、就業促進活動，共辦理 26 場，510 人；(3)雇主座談會，共辦理 22 場，738 人；(4)試辦出獄前就業適應團體，共辦理 22 場，343 人，以協助具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的更生受保護人，提前做好進入職場接軌的準備，及提升就業適應能力等，期促其順利重返就業職場，94 年度共輔導 134 人次就業。

參考文獻

王瑞婉（2003）隱藏的家庭——受刑人家庭現況初探，兒童少年保護——從家庭做起國際研討會，嘉義：嘉義大學。

- 台中縣生命線協會（2006）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心 95 年度團體活動報告書，台中：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心和台中縣生命線協會出版。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中彰投就業服務中心（2007）中彰投就業服務中心 2007 工作計畫書，台中：職業訓練局中彰投就業服務中心。
- 周憐嫻（2005）更生人就業權、雇主僱用權與社會安全的平衡，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報（6），55～91。
- 法務部犯罪問題研究中心（1992）收容人更生意願之研究，台北：法務部。
- 法務部犯罪問題研究中心（1999）出獄人就業調查報告，台北：法務部。
- 施教裕（2002）生態系統觀點，出自宋麗玉、曾華源、施教裕、鄭麗珍等，社會工作理論—處遇模式與案例分析，213～247，台北：洪葉。
- 徐全裕（1998）假釋出獄人行爲表徵與再犯預測，觀護（28），2～9。
- 張智雄、柯雨瑞（2005）毒品強制戒治處遇成效與再犯影響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報（6），247～276。
- 陳明和、郭靜芳（2005）從後殖民女性主義的觀點探究東南亞外籍配偶在臺社會適應之研究，國民教育研究（9），143～171。
- 曾華源、郭靜晃（2000）少年福利，台北：洪業文化圖書公司。
- 曾學經（2004）更生保護組織變革及前瞻—台灣更生保護會組織變革後應有之作為。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六)，台北市：法務部犯罪研究中心。
- 廖滿足（2005）更生事業僱用更生人就業之管理現況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勞工所碩士論文。
- 蔡德輝、楊士隆（2003）犯罪學（修訂再版），台北：五南。
- 鄭峰銘（2006）更生人家庭復原力之研究，嘉義：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麗珍（2002）生態系統觀點，出自宋麗玉、曾華源、施教裕、鄭麗珍等，社會工作理論——處遇模式與案例分析，249～280，台北：洪葉。
- 盧台華（2006）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之信效度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特殊教育研究學刊（30），1～25。
- 聯合報，2007 年 5 月 31 日。
- 嚴健彰（2003）出獄人復歸社會更生歷程之研究——從復原力的觀點探討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嚴健彰（2005）出獄人生涯發展之社會適應與就業問題初探，諮商與輔導（229），11～15。

法務部「更生受保護人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轉介輔導機制」，
<https://www.moj.gov.tw/public/Attachment/moj>

Ajzen, I., & Fishbein, M. (1985)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and theory. Addison-Wesley: MA.

Bandura, A. (1997)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New York: Freeman.

Gottfredson, M. R. & T. Hirschi. (1990)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rasmick, H. G. & Bursik, R. J. (1990) Conscience, Significant Others, and Rational Choice: Extending the Deterrence Model. Law & Society Review, 24(3), 837-861.

Kissman, K. & Allen, A. (1993) Single-Parent Familie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Rex, S. (1999) Desistance from offending: Experiences of probation. Howard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38(4), 366-83.

Zillmann, D. (1993) Mental control of angry aggression. In D. M. Wngner & J. W. Pennebaker (Eds.), Handbook of Mental Control.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